

讲道理

醉放先生著

在一个家庭中，如果没有相互沟通、讲道理的气氛，那这个家庭的几个子女就不可能一直团结；在一间公司里，如果工作中缺乏相互沟通、讲道理的机制，那这间公司就会缺乏竞争力。

本作品通过信息的流通来解释说明讲道理的前题和条件，指出：只有讲道理，才会产生大家都遵守的共同良知和道德规范。如果大家都可以讲道理，大家都能有效地沟通，那社会和群体的成本就会是最低的。

目录

- 01 [什么情况下才能讲道理](#)
- 02 [信息](#)
- 03 [公共信息与私人信息](#)
- 04 [信息的流通与技术的进步](#)
- 05 [信息自由](#)
- 06 [言论自由的限制](#)
- 07 [信息对称与信息不对称](#)
- 08 [信息封闭](#)
- 09 [群体的开放与封闭](#)
- 10 [信息与权威](#)
- 11 [说理](#)
- 12 [共赢](#)
- 13 [说教、利诱、强制](#)
- 14 [公共说理](#)
- 15 [说理平台](#)
- 16 [小群体的说理](#)
- 17 [讲道理](#)
- 18 [社会公共常识](#)
- 19 [良心](#)
- 20 [良知](#)
- 21 [共同良知](#)
- 22 [知耻](#)
- 23 [道德](#)
- 24 [道德直觉](#)
- 25 [道德基因](#)
- 26 [道德意识](#)
- 27 [道德的消退与泛化](#)
- 28 [判断道德](#)
- 29 [讲道理能增进家庭和睦](#)
- 30 [讲道理能提高企业竞争力](#)

前言

在一个家庭中，如果没有相互沟通、讲道理的气氛，那这个家庭的几个子女就不可能一直团结；在一间公司里，如果工作中缺乏相互沟通、讲道理的机制，那这间公司就会缺乏竞争力。

本作品通过信息的流通来解释说明讲道理的前题和条件，指出：只有讲道理，才会产生大家都遵守的共同良知和道德规范。如果大家都可以讲道理，大家都能有效地沟通，那社会和群体的成本就会是最低的。

作品主要反映：

（1）公共说理就是建立在参与各方平等的基础上，信息公开，说服中立的具有独立思考 and 判断能力的第三方听众。这是公共说理原理，即是讲道理第一原理。

（2）共同良知是由公共说理而获得的社会公共常识，是社会信息自由的产物。这就是共同良知原理，即讲道理第二原理。

本作品阐述浅白，只反映作者的观点，不试图成为学术性的著作。

01 什么情况下才能讲道理

当你遇到委屈、受到伤害时，就希望能够讲道理。于是，你就找对方论辩、说理，但常常难以达成令人信服的共识。

因为这种论辩式说理的局限似乎与人类自以为是的弱点有关，辩论是不能说服别人的。休谟（David Hume）说过，“一切深奥的推理都伴有一种不便，那就是，他可以使论敌哑口无言，而不能令他信服。”因为你可以对他的逻辑推理前提提出疑问的。十七世纪英国牧师和历史学家富勒（Thomas Fuller）也说，“辩论从来不能说服不想被说服的人。”二十世纪美国作家塔金顿（Booth Tarkington）更是说，“辩论会使人们更坚定地只是相信他们自己的想法。”

那什么情况下才是真正有效的讲道理呢？让我们从信息及其流通说起。

02 信息

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们都生活在各自所属的组织、圈子、宗族、公司群体中，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的地位，有自致地位和先赋地位，即：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作为个人努力与否的结果而获得的自致地位；和，某人所拥有的被指定的、而且通常不能改变的先赋地位，包括种族、民族、年龄、性别和某些家庭内的地位。

人们在群体中，相同或不相同地位的人彼此间都不停地进行着沟通、互动，信息不断的流通。那什么是信息呢？20世纪40年代，信息的奠基人香农（C. E. Shannon）给出了信息的明确定义：信息是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

这一定义被人们看作是经典性定义并加以引用。香农证明的一个基本定理表明，一个体系的

信息含量等于对该体系的完备的统计描述进行编码所需的二进位数的最少位数，信息所反映的是其可能的存在状态的量值，单位是比特（bit）。通俗地说，“不同”就是信息，信息提供了事物间的差异，以便能确认他们的“不同”。信息量越大，体系就越有序，越具有确定性。

03 公共信息与私人信息

有人把信息分为公共信息与私人信息，公共信息是指群体成员都应具备的公共知识，而私人信息是指群体中个别成员或个别组织所拥有的具有独占性质的知识，即所谓的个别知识。

私人信息包括如私隐、国家秘密及公司机密等，是一个应受到保护不能随便流通的信息。私隐是指不愿意为人所知或不愿意公开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私生活和个人秘密。国家秘密是指一旦泄露就会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受到一般的危害和损失。公司机密则指一旦泄露就会使公司的利益受到一般的危害和损失。私隐、国家秘密及公司机密都是受法律保护的。

因此，信息流通一般指的是公共信息的流通。

在经济学中，也有公共信息与私人信息概念。公共信息是指所有市场参与者都能够自由获得的信息。私人信息则指个别市场参与者所拥有的具有独占性质的市场知识，其中经验是市场参与者的最宝贵的个别知识。个别知识与公共知识之间没有严格界限，个别知识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为共同知识；相反，共同知识也如此。如果某个时点上的市场参加者所具有的个别知识落后于或在质量上劣于市场共同知识，该市场参加者就在信息上处于劣势或不利的地位，信息经济学将这种环境状态称为信息劣势。

信息优势使市场参加者易于获取市场价格体系等信息系统所传播的最新信息，从而能够对市场资源实施更为有效的配置。反之，信息劣势则使市场参加者难以获得新信息，从而在资源配置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私人信息是具有竞争性的，需要个人的努力。例如，我不断地学习，那我的知识量自然就大了。没有公共信息的自由流通，个人获得知识的竞争就失去公平性，社会总的信息量就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但私人信息不应该随便地自由流通，例如药物配方、尖端技术、版权等都是私人的东西，应该受到保护，否则，就没有人去搞科研、做学问了。

04 信息的流通与技术的进步

信息的流通与技术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文明之始，人们还未有文字，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是口受相传的。后来有了文字，有了报纸、电台、电视台，平头百姓就成了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互联网时代，经历了两次革命。一次是 Google 的革命，即是探索引擎的革命，使得人们寻找信息、寻找知识的时间大为缩短。另一次就是 Twitter 的革命，即是微革命。成千上万的人们参与了微博的言论，这使得平头百姓与传媒集团的言论处于相对的平等，人们再不只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还是信息的传播者。

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信息的流通，但当信息流通受到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等的制约时，科技的发展也会受到阻碍。我们知道，人类社会本质是一个耗散结构，但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是

一个近似平衡系统。人们的自由、信息的流通、社会的平等有利于交流，是趋向无序的东西；而经济生产、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则是有序的东西。在这一个近似平衡系统内，一些走向有序的东西可能出现自我强化的现象，社会的平衡就会被打破，经济生产、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稳定都会受到影响，会引发危机，这就需要增加人们的自由、信息的流通、社会的平等来实现平衡。（关于这一段的详细解释，请阅读本人的另一作品：《宇宙的平衡》第13章人类社会）

05 信息自由

言论自由是信息自由的一部份，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与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通常被理解为包含了充分表述的自由。信息自由的基础是平等，只有平等，信息才可以自由地获得与输出。

自由能保证个体不受权威限制，自由就是人们具有对权威说不的权利。勒尼德·汉德（Billings Learned Hand，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说：“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法国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第四条说：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

自由的前题是经济独立。经济上不独立，个人失去独立之人格，思想听命于管理者，则根本无法产生平等与自由。自由的底线和原则，是保护每一个个体的自由。自由的观念在当前世界较为流行，有观点认为自由是促进人类进步的最伟大的原动力之一。而政治上的自由包含着责任。不负责任者是自由内部的敌人。不负责任有一种形态，就是狂热的崇拜。常见的不负责任是官僚主义。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和匮乏”。世界人权宣言中的第十九条：人人有主张及发表自由之权；此项权利包括保持主张而不受干涉之自由，及经由任何方法不分国界以寻求、接收并传播消息意见之自由。

社会群体中，个人在参与社会活动中都要遵循行为规范，是社会认可和人们普遍接受的具有一般约束力的行为标准。包括行为规则、道德规范、行政规章、法律规定、团体章程等。在群体行为规范保护下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保证了公共信息的自由流通。

06 言论自由的限制

言论自由是有限制的，言论自由是公共信息的言论自由，而不是关于个人的私隐、机构或国家秘密的言论自由。有害于他人的议论也有可能是被禁止的，例如，发放色情或煽动仇恨的言论及信息是被禁止。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可通过法律制裁或群体公众的反对来实现。

自由本来就以不侵害别人的自由为前提，在限制之外，存在广阔的自由天地，这恰恰是需要保护的。什么样的自由是不伤害别人呢？例如一夜情是否会伤害了对方的配偶，等等，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答案。一般地，在一个法治的国家，法律没制止的都是公民可以干的。

在一些国家，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按照“实质性伤害”为前题，即必须使得言论的对象造成实质性伤害才进行限制；如果没有造成实质性伤害，即使在紧急情况下公开表达意见也不应被完全压制。有些言论自由比较宽松的国家对诽谤罪、煽动罪就有非常严格的限制，但在多数国家，“煽动暴力、煽动仇恨”都不受言论自由保护，尤其是煽动颠覆政府的言论，更加不受保护。在美国，由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1841--1935）

<http://xian.name>

大法官 1919 年首次提出一个判断原则叫“明显且即刻的危险”。在 1931 年尼尔诉明尼苏达州案中，已经九十岁的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大法官认为“就算那些噤声之语存在错谬，但也可能，而且通常是，包含了部分真理。”

有的国家的立法明确规定：陈述观点的言论不能算诽谤。这些国家对诽谤罪的定义是必须使得言论的对象造成实质性伤害。而死人是不会存在实质性伤害的，为此，立法明确规定：“诽谤罪的前提是针对活人”。也就是说，你可以随便骂已经死亡的人而不算诽谤。有些国家的立法，对普通人的保护力度比对公职人物的保护力度大得多。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宣布媒体在“对错误陈述信以为真”的前提下发布不实之词，应豁免于诽谤诉讼。小威廉·约瑟夫·布伦南(William Joseph Brennan, Jr., 1906-1997)大法官将此称之为“实际恶意”原则。但是，有些言论自由不太宽松的国家，不区分“公职人员”和“普通人”，如，新加坡的领导人就善于用“诽谤罪”来打压反对声音。

07 信息对称与信息不对称

根据群体中各人分享的信息情况，我们分为信息对称与信息不对称两种。

信息对称在广义上是指群体成员拥有的信息量相同。但由于成员间存在认知能力的差异，信息不可能绝对的对称，为此，我们常常把信息对称给出狭义的定义：相关信息为所有参与各方共同分享的局面，如证券市场上对某股票信息进行充分公开披露，所有投资者处于相同的分享信息地位。

信息不对称则指群体中的各人分享、拥有的信息量不相同。在群体各种活动中，一些成员拥有其他成员无法拥有的信息，由此造成信息的不对称。

在信息流通中，公共信息得到充分的自由流通，我们就称之为信息开放。只有信息开放，信息才会越来越对称的。

08 信息封闭

因为私人信息的差异而引起的信息不对称是正常的个人竞争结果，但如果因为公共信息的沟通渠道受到阻滞而导致信息不对称将使到社会效率的降低。信息的对称性增加应该源于公共信息的开放，而不是私人信息的开放，私人信息是受法律保护的无需公开的信息，而公共信息则是应该公开的信息。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

如果因为经济落后、技术落后而产生信息流通障碍，使公共信息得不到充分的自由流通，我们称为信息流通阻滞；如果有人为了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人为地限制某部分公共信息的自由流通，我们称为信息定向封闭；信息流通阻滞和信息定向封闭合称为信息封闭，都会产生或增加信息的不对称性。

沟通就是通过语言的信息流通。夫妻之间、亲朋之间、上下级之间加强沟通可以减少误会，增强共识，增加信息的对称性。几年前，香港的一个公益广告有一句：“子女好与坏，在乎

在统计学上，置信度与把握度（置信水平与检验功效）都与样本的方差与自由度有关，方差越大、自由度越小，置信度与把握度就越小。方差越小、自由度越大，置信度与把握度就越大。我们认为，群体的置信度是指群体的主导者是否有足够的诚信，群体主导者的指令能否可靠地得到执行的；而群体的把握度是群体行为是否真的能收到实效。在群体中，如果贫富严重不均（财富的方差大），群体成员的信息自由受到限制（自由度小），那这个群体的置信度与把握度、诚信与实效就会降低，群体就失去了凝聚力。当社会设置能充分允许群体中的信息自由流通时，群体中的信息就越对称，群体的诚信与实效就会提高。（关于这方面内容，在另一作品《风险的判断》中有详述）

例如：父母偷偷地给钱他们偏心的儿子，久而久之，就个儿子就会认为这是应得的。同时，因为信息不对称，这个大家庭就失去了凝聚力。如果这对父母不是“偷偷”的，其他子女就知情了，就会议论、甚至异议。信息相对对称了，那个儿子就不会认为父母对他的偏心是“应得”的。

09 群体的开放与封闭

人类有“控制欲”的本性，就是控制别人的一些行为，通常内心有较强不安全感的人控制欲望也强烈一些，那些谨小慎微、追求完美、心里总不踏实的人更希望控制别人。控制欲就限制别人某方面的知情权，这些都会导致信息定向封闭。

在信息不对称之下，那些拥有信息优势的人就可以拥有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且，为了获取更多财富、资源，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还可以通过信息定向封闭，限制信息的自由流通来拥有更多的信息优势。于是，贫富越悬殊的群体越有限制自由的冲动，而自由越受限制，贫富就越来越悬殊。

人为地信息定向封闭，使信息的不对称性增加，从而增加社会的总体成本，限制了科技的发展，妨碍社会的进步。信息开放能增加信息的对称性，增加社会的诚信度和人们获得信息的能力，降低社会的总体成本。例如，信息不对称时，人们的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就需要支出额外的信息传播费用。

一个理想化的社会，一个世外桃源，应该是一个贫富相差不大的、人民自由度非常大的、信息能最大限度地自由流通的社会，社会具有足够的诚信与实效。而一个贫富悬殊的、人民的自由受到很大限制的社会，是一个充满危机的社会，社会丧失了信用和功效。信息自由流通程度越高，社会的诚信、实效就越高。

世界上并没有完全的信息对称或完全的信息不对称，随着社会和技术的进步，信息会越来越对称。我们把开放信息的群体就称为开放群体。否则，封闭信息的群体称之为封闭群体。对于一个特大群体——社会，就是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

在封闭群体，并不是所有信息都是封闭的，那些群体的管理者认为通过定向信息封闭就能使自己拥有更多优势的那些信息就可能被定向封闭。一些传统的社会，如封建社会，由于科技落后，信息流通困难。这样的社会也是封闭社会。

10 信息与权威

群体的文明之所以得以进步，就需要有权威的引领，同时又有对权威提出疑问的权利，即所谓正确不确定的精神，即自由的精神。

在群体中拥有地位的人自然就拥有权威，而权威又可以使人更容易在获得信息优势。如果人们没有对权威提出疑问的权利，那么那些所谓的权威人士就会利用其“权威”，不合理地获得更多的信息。

我们常将权威分类为二：其一是内在的，人们心悦诚服地遵守的权威。其二是外在的，人们因为既定规则或强力威胁而遵守的权威。根据韦伯（Max Weber）的政治社会学论述，现实世界的任何权威，也或多或少要依赖于外在的遵守，即官僚化的制度力量。

权威的外在与内在特性，对应着群体的开放与封闭状况。

在开放群体，人们可以批评权威。于是，拥有外在权威的管理机构就得拥有较强的内在权威，他们的管治就会是比较合理的、合法的，这样的管理者才能容得下不同的声音，能顾及他人的利益和思想。

在封闭群体，那些管理机构常常没有什么内在权威，只能靠外在权威来维系其管理，他们的管治就失去合法性，他们只能靠群体强制的体制来维护稳定。他们容不下不同声音，只能限制人们的言论。

例如，在一个封建思想深厚的宗族，宗族长老拥有很大的权力但道德败坏，就连媳妇都逃不了他的淫威。如果宗族成员有什么不满，有反抗的话，这个宗族长老动不动就用祖宗家法。在这个宗族群体里，长老的权威就只剩下外在权威了。

11 说理

到现在，有关“信息自由流通”的知识已经讲了一大堆，讲道理就是在“信息自由流通”的前题下进行的。在一个群体，当信息自由流通时才会出现讲道理。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利益的冲突就时有发生。为了调和彼此矛盾，就需要讲道理，就要加强彼此间信息的流通，摆事实，看看谁合理。

说理是指在社会活动中，开始于互不信服而进行说服对方的过程。当人们在信息交流中各自掌握的信息不同，对信息的理解不同，从而产生了彼此间观点与认知的冲突。通过信息开放，就可以有效地减少这些冲突，实现信息的相对对称，进行说服对方。如果在信息不自由流通的情况下使对方无言而获得利益，那不是说理，那是欺骗。

我们所说的说理常常是论辩式的说理，说理不同于说教，说教是指作为说教的的一方掌握某种信息优势、或具有某种权威而进行的说服工作。

说理可分为公共说理和私人说理。以中立的具有独立思考 and 判断能力的第三方为说理对象的说理就是公共说理，而私人说理就是双方相互说服的说理。我们平常所说的讲道理就是公共说理。

12 共赢

在自然科学上，在公认的定义和公理为前题，在某种程度上，双方的论辩式说理是可以达成令人信服的共识的。然而，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双方的论辩式说理常常难以说服对方。

论辩式说理是建立在参与各方平等的基础上的，都有“自己说得通”的理性，但却没有公共理性，即别人无法接受它的前提。说理的局限似乎与人类自以为是的弱点有关，人类自我服务的偏好是极其强大的，个人利益以及固执和偏见也似乎比理性更近于人的天性。双方的论辩式说理起到的只是强化自己一方，而并非软化对立一方的作用。人们日常生活中许多说理的实际效果都常常只是越说越觉得自己有理。为此，严格上说，私人说理不属于讲道理。

在私人说理中，特别是当双方的利益存在着冲突时，其论辩式说理更是水火不容。然而，当双方能找到共同利益时，就能找到大家认同的观点，实现共赢，这个情况，我们一般不应该简单地当成是说理，它应该是“共谋”。

13 说教、利诱、强制

说理是建立在参与各方平等、信息自由的基础上的，而说教是一方对另一方信服、或一方对另一方依附为前题才存在的。当在日常社会活动中，人们常常混淆说理与说教，在双方互不信服时进行说教，那就只有越说越不服。

如果一方具有内在权威，“就可以使别人心悦诚服。如果彼此间没有权威，就常常使用利诱或共赢策略。因为通过平等的辩论是不能说服对方的，以诉诸利益为前题就另当别论了。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说：“如果你想要说服别人，要诉诸利益，而非诉诸理性”，即使是动机很高尚的时候。这种以诉诸利益为前题来“说服”对方的行为，是属于利诱而不是辩论。当没有内在权威但具有外在权威的时候，除了利诱，还可以通过强制来使别人表面上服从。

例如，中国历史上的纵横家就是以利诱来“说服”别人的。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苏秦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合纵六国，配六国相印，统领六国共同抗秦，显赫一时。而张仪又凭其谋略与游说技巧，将六国合纵土崩瓦解，为秦国立下不朽功劳。所谓“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此为《鬼谷子》之精髓所在。

14 公共说理

在人类的社会活动中，要调和矛盾，使矛盾双方真心实意地和解，最有效的方法就只有公共说理。公共说理是以群体的共同利益为说理准则，因此，公共说理就是说服公众，或者说服公众的代表，而不是说服对方。英国人图尔敏（Stephen E. Toulmin）认为，公共说理就是说服中立的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第三者听众，而不是说服自己一方或对立一方的人员服从。

公共说理不是一套寻找真理的哲学，而是处理不同意见的对话模式。由于各方不愿或无法放

<http://xian.name>

弃各自的利益，仍然会无法说服对方，说服或争论不可能无限继续下去。于是，说理需要有中立的第三方，要求辩论者在说理时，要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仔细检查自己论证的每一个部分，并尽量事先估计对立一方可能提出的反对理由。

人类祖先进化出了共享意向性，使得人类拥有共享、合作、共情、学习和遵守行为规范的能力，形成公共说理的原始形态。人类有了共享意向性之后才出现语言，使信息流通更为便捷，公共说理更为流行。

公共说理是论辩式说理，建立在参与各方平等的基础上的。在公共说理中应该具备：

(1) 信息自由流通。信息自由流通建立在参与各方平等的基础上，平等是说理的基础。同时，说理双方的言路必须是充分开放的，而不是信息定向封闭。在公共说理中，说理双方都可以自由平等地获得和诉说与说理内容相关的所有信息，如果言论自由受到人为的制约，公共说理就不成立。

(2) 说理平台。公众或者中立的具有独立思考 and 判断能力的公众代表都是可以成为中立的第三方，都可以构成说理平台。

为此，构成说理平台的第三方可以是公众，或者是在公众中具有内在权威的“代表”。

例如，在法庭上，有争执的双方各自陈述自己的立场和理由，同时还就对方陈述中的具体环节和细节提出质疑。各方在这么做的时候，是为了说服中立的法官或陪审员，而不是为了说服自己一方或对立一方的人员，因为自己人无须说服，而对立一方的人又根本不愿被说服。法官和陪审员是典型的第三方听众。辩论者在说理时，要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仔细检查自己论证的每一个部分，并尽量事先估计到对立一方可能提出的反对理由。

15 说理平台

说理平台的组成可以是下列之一：

(1) 公众。全体公众都能参与的公众舆论、公共媒体、公民投票等所组成的平台就是公众说理平台，是最基本的说理平台。

(2) 中立的具有独立思考 and 判断能力的第三方。中立的、具有一定素质的公众代表，具有代表性的如议会、代表大会、陪审团，具备理性思考素养的如法官、裁判员等，只要是公众认可或信服的第三方都可以构成说理平台。只有外在权威而没有内在权威的、处事不中立的人和组织构成不了说理平台。

例如，在乡下，兄弟因利益而产生了矛盾，家族中的叔伯长辈会叫他们兄弟俩坐在一起说清楚事情因由，这些叔伯长辈实质上是为他们兄弟提供了说理平台。

在公共说理中，第三方越是具备理性思考的素养，他们的舆论机制就会对争论说理的双方提出越高的文明礼仪要求。谁在争论中穷凶极恶、出口伤人，不管他说得多么头头是道，都已经先在第三方眼里成了不值得尊敬，不值得信任的人。在开放群体中，人们容易找到代表公众的具备理性思考素养的公众代表，人们都在言路充分开放的公共说理中成长起来的。而在封闭群体中，由于定向封闭信息，那些“精英”们常常缺乏独立思考 and 判断能力，处事不中立。

16 小群体的说理

一个利益共同体内的也能够构成说理，例如：宗族、公司等。在一个利益共同体中，说理常常是内部的事，他们都不想与组织利益相关的信息被公开。但是，在这个利益共同体内的普通成员（公众）或其权威代表就可以构成说理平台，在其说理双方及其说理平台内，信息应该是开放的。这样的说理就是这个利益共同体内的公共说理。

一个小群体可以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可以组成说理平台的群体，受这个较大群体的社会公共常识所制约。于是，这个小群体私人的论辩就应该以这个群体的社会公共常识作为辩论的准则。但是，这样的说理仍然是双方的辩论式说理，常常不能诉诸理性。到最后，这个小群体内部矛盾还是有可能到一个他们所属的较大群体中进行公共说理。任何的说理，最终都可以进行公共说理。当然，如果双方存在共同利益，他们可以通过辩论、谈判等达成共识，实现双赢。例如，在夫妻之间的事通常不想外人知道，是他们的私隐，他们的争论就常常是私人的——不能诉诸理性的双方辩论式说理。于是，夫妻间解决矛盾、维系夫妻关系的方法常常是来源于情感与共同利益，而不是双方的公共说理，所谓“床头打架床尾和”。当这对夫妻产生了很大的矛盾时，就算是情感及其共同利益也难以维系夫妻关系时，他们之间的某些信息就可能不再是私隐了。这时，夫妻双方的父母亲朋就可以组成一个规劝这对夫妻的说理平台。

在自然科学上，双方论辩是以公认的定义和公理为前题，而且还可以有权威科学家的指引。自然科学上的学术会议、科学杂志、预印本等就是一个信息交流与说理的平台，引领着科学的进步。

17 讲道理

我们平常所说的讲道理就是公共说理，因为私人说理是无意义的。在没有讲道理的情况下，人们常常只有通过利诱等达成共识。

在社会活动中，双方利益出现冲突的解决办法：

- （1）参与不平等时，利诱、说教及强制。
- （2）参与平等时，共赢策略与欺骗利诱。
- （3）参与平等、信息开放且具有中立的具有独立思考 and 判断能力的第三方时，讲道理，即公共说理。

也就是，只有在参与时平等、信息开放且具有中立的具有独立思考 and 判断能力的第三方时，才能讲道理，否则，就只好用利诱，甚至是使用强制。这是公共说理原理，即是讲道理第一原理。

当我们进行经济、社会活动时，不是所有的场合都是可以讲道理的，例如，一个员工见上司，一般来说，彼此是不平等的。于是，只会是上司对他的说教，而不会是讲道理。如果他想要说服上司，就只能诉诸利益，而不是讲道理。当你与一个合作者讨论合作方案时，你们之间并没有中立的具有独立思考的第三方听众，因而，就不存在讲道理，只能诉诸利益，寻找共赢的议案。

常识就是人们无需花力气思考就能作出决定的知识。在日常生活中，普通大众都知晓的大概率事件也是常识。当我们看到乌云盖顶时就去收衫了，这就是常识。人类具有条件反射本能，当遇到危险时或战或逃的决定是非常迅速的，这些条件反射也可以看作是常识。

常识就是捷径，它使得人们能够采取更自动、更原始、更单一的反应方式。我们的思维能力有它的极限，而且为了提高效率，有时候我们也必须放弃耗时的、复杂的、全局的决策方式。例如，在决定是否答应某人的要求时，我们常常只根据相关信息中的某一条做出决定。“地位高就是能力强、价格贵就是品质好”都是常识，有的商家会利用人们的这个常识来推销产品，把价格提高让消费者误以为是质量好的商品。

公共说理能产生社会公共常识。一个群体的社会公共常识常常是这个群体成员共同的常识，是共同的行为准则。这个准则就是维系这个群体的基础。那些以公众素质低下为名否认公众说理的常常是封闭群体的行为。例如，在南方的乡村，人们常常围着村前的榕树头聊天，那些做事过分的人就担心被别人说三道四，榕树头就成为村民公共说理的平台。在那里，人们以大部份村民为说服对象，久而久之，就会产生村民的社会公共常识。

在社会活动中人们常常运用社会公共常识来处事，但当社会公共常识混乱的时候，人们就无所适从，产生什么也信不过的感觉。

19 良心

人性具有双重性，是自私与无私的混合。广义上的自私是指：基于个人利益需求做出的行为及反应。而在狭义上说，自私是指个体面临自己利益与对方冲突时，会不计对方损失，以满足自己利益为主；自私者在进行自私行为的同时，通常能察觉自己的行为可能损及别人的利益，但仍按照自己利益不择手段。

我们的基因造就了各种思维单元，有的思维单元是自私，而有的则具有目的性的利他行为，为群体利益而奋斗，这就是无私。无私由亲缘选择与互惠塑造，受流言与声誉所强化。

生命是多层次的，各个层次都可能发生竞争。人性的层次就是个体与群体。那些越有效的、越具竞争力的群体，就越具有抑制自私自利的无私之心，使得自私者在进化中受到抵制。敬畏自然界与集体活动可以增加无私之心。

人类祖先进化出了共享意向性，出现无私之心。良心就是无私之心，是对客观现实善恶的反映。良心与生俱来，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为了种族的延续而设定的，例如，母性、知耻、不能伤害自己及别人、厌恶不洁之物等。良心判断是直觉式的、感性的快速判断，并非来自理性计算。

人一出生，就带有各种良心的基础模块，它由神经元、神经递质及激素构成。例如，产生关爱的催产素，产生同步性的镜像神经系统等。不同的良心模块对我们有不同的指引，包括有：关爱与伤害、公平与作弊、忠诚与背叛、权威与服从、自由与压迫等，是进化带给我们的本能，每个人对这些模块内涵的轻重搭配不尽相同，即对它们的取舍不一样，因而，每个

人的良心不尽相同。

这些基础模块能够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种事件进行模式识别，这些模式识别能力写在基因之中。科学家们认为，这些基础模块，在过去千多年来，不论人类环境如何改变，仍保持稳定状态。

20 良知

感觉，是对客观现实个别特性（声音、颜色、气味等）的反映，由来自物质世界的一定刺激直接作用于有机体的一定感觉器官，在感官内引起的神经冲动，由感觉神经传导于大脑皮层的一定部位产生感觉，如光线引起视觉，声波引起听觉。人与动物的感觉不同，动物的感觉只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人的感觉则包括社会发展的产物。感知，是对感觉的解释，是人类用心念来诠释自己器官所接收的信号，是客观事物通过感觉器官在人脑中的直接反映。有些东西是我们的感官无法直接来感觉的，如：紫外线、粒子与电磁波等等，我们可以制造各种仪器和借助工具来感知它们的存在。

良心与良知象感觉与感知，但也有很大的不同。良知为良心赋予含义，是对良心的解释，但不是完全地如实再现。然而，良心与良知都是大脑的活动，良心在潜意识层面，而良知则在意识层面。作为良心解释的良知，是理性的，为自己的感情服务，常常是先有了答案再去想办法找证据。良知会影响良心，但只会影响良心模块的取舍，而不能修改良心模块本身。

良知是良心自然发展的结果，也包括社会发展的产物。良知的来源有：

（1）基因设定的良心通过解释而表现在良知层面。我们称之为固有良知。

（2）通过家族、社区的影响；通过文化传承等而获得的思维能力和判断力，是从小就被潜移默化、不言而喻、无须特别学习而得的良知。我们把这部份良知称为响应良知，具有种族的、文化的、宗教的特点。

（3）由个人的经历而获得的、具有个体差异的良知。我们把这部份良知称为自发良知。

各人的良知不尽相同的，包括个体的、种族的、文化的、宗教的差异。

21 共同良知

每个人的良知不尽相同，我们分之差异良知与共同良知。共同良知是由公共说理而获得的社会公共常识，是社会信息自由的产物。这就是共同良知原理，即讲道理第二原理。

共同良知（有时候简称“良知”）是普世价值观，是普通人、正常人都共同知晓的社会活动常识。在未有语言的共享意向性时期，通过共享意向性也能产生一些原始的共同良知。

人们的共同良知有利于集体文明，如：不能贪污和损害公共财产、社会地位要有能者居之、不能不劳而获、劳动付出应与你的收入相匹配、不应窥视别人的隐私等等。

固有良知是基因设定的，但因为良心模块内涵的取舍、搭配不同而出现差异。我们可以提取各人固有良知的共同部份，但都应该建立在公共说理的基础上。

22 知耻

马克斯·舍勒 (Max Scheler, 1874-1928) 认为, 人之所以超越动物的地方是精神, 它包括: 思维、观察、意愿、爱。动物虽然有许多感觉与人相同, 譬如畏惧、恐惧、厌恶, 甚至虚荣心, 但是它似乎缺乏害羞和对羞感的特殊表达。

知耻是固有良知, 是人们做了一些与自身价值观相违背的事而产生的羞愧感。每个人都有羞愧感, 它保护人的良心、尊严不受侵害, 保证群体在人类进化中的地位。人人都有知耻良知, 知耻是基因设定的, 她保证了族群的延续; 具有良好知耻的个体能够保证在族群的诚信声誉和地位。

当人做了一些与自身良知相冲突时产生知耻体验, 而这个内心冲突和与其相伴随的强烈情绪体验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压力。压力是表示一种使人感到紧张、焦虑并产生应激反应的心理状态, 而行为与良知的冲突就成为应激源。

应激源又称应激因素, 指任何能产生应激反应的有害刺激。根据应激源持续时间的长短, 可将应激源划分为急性应激源和慢性应激源。应激反应, 就是随着应激源的出现, 情绪紧张, 使得大脑的情绪中枢处于兴奋状态, 随即向内分泌系统发出指令, 使肾上腺分泌出大量肾上腺素, 刺激血压升高、心跳加快, 使肝脏分泌出大量的糖供给血液, 给大脑和肌肉输送更多的能量, 从而使人的反应更加机敏、有力量。应激状态下, 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充分调动自身的全部潜能, 但也会影响到免疫系统, 机体的防御机制等也发生变动。在高密度条件下社会心理性的应激反应, 可带来生殖机能的降低和死亡率的增加。结果是: 常常高密度产生应激反应的种群趋向于崩溃。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项通过观察狒狒的研究, 很好地反映了人类社会。这项研究涉及到 125 只来自肯尼亚不同社会群体的雄性狒狒。研究人员在为期 9 年的试验期间, 通过检查狒狒的粪便, 不断研究它们的应激激素 (糖皮质激素和睾丸激素) 水平。科研人员发现, 位居高位的雄性在所有时间段的压力都比其他雄性更大, 即便在平静的时候也是如此。压力是毁掉健康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会引起心脏病、癌症, 大大缩短寿命。

23 道德

道德是个人自身良知的产物, 是自己对自己的契约, 是个人的行为规范。

由于差异良知, 每个人的道德底线都不相同, 一百个人有一百个的道德观念, 有一百个世界观。如一夜情, 有人可以接受, 有人甚至提倡, 而有些人则认为是不道德的。为了区分良知与道德, 一般地, 我们常说的良知是指共同良知, 是社会公共常识, 不包括个人差异; 而道德, 则存在个人差异。

我们不应随便地以自己的道德准则来衡量别人, 以道德的名义来限制别人的自由。但是, 人类社会应该有共同的道德底线, 而这条底线则常常由共同良知来划定。不同群体, 不同宗族都有其道德底线, 这个底线就是他们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 这就是集体主义道德, 是这个群体的公德, 为了群体的利益而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公德与共同良知相关, 是社会公共常识; 而私德, 是与个体的差异良知相关, 指个人品德、作风、习惯以及个人私生活中的道德。

道德有着不同的内容。乔纳森·海德特 (Jonathan Haidt)通过对大量受试者的道德测试题进行统计的办法,提出一个关于道德观的基础理论。他认为人脑中有六个最基本的道德模块,能够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种事件进行模式识别,自动做出道德判断。当面对同一件事,如果不同的道德模块对我们有不同的指引的时候,各人的取舍可能很不一样。有人可能因为感到同性恋很恶心而反对它,也有人可能认为自由更重要而支持它。

(1) 关爱 / 伤害。我们看到小孩受苦就会想要帮助他,这是哺乳动物的本能。更进一步,我们可以用关爱精神去对待所有亲人乃至整个社会。

(2) 公平 / 作弊。这是与他人合作中的一种互惠机制,人们自然地认为合作产生的共同利益应该公平分配,如果有人作弊多占,我们就会愤怒。因为关爱而产生的利他行为属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不计回报,而这里出于公平合作而产生的利他行为是有回报要求的。如果一方不断付出而另一方不付出,那就是不公平。

(3) 忠诚 / 背叛。这可能是爱国主义的起源。忠诚感带来的凝聚力对团队竞争很有帮助,对外来威胁非常敏感。

(4) 权威 / 服从。这是对长辈和地位高的人的尊敬。在一个有深厚传统的社会中,人们之所以讲礼,并不仅仅是因为敬畏权威的地位,而更是对现有社会秩序的敬意。

(5) 圣洁 / 堕落。这是一个有点宗教味道的道德模块,对应的感觉就是“恶心”,是一种厌恶不洁之物的进化本能。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行为,就有可能是出于恶心。

(6) 自由 / 压迫。不论如何,每个人都认为自由很好,压迫不好,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

24 道德直觉

心理学认为:“情绪是指伴随着认知和意识过程产生的对外界事物的态度,是对客观事物和主体需求之间关系的反应。是以个体的愿望和需要为中介的一种心理活动。情绪包含情绪体验、情绪行为、情绪唤醒和对刺激物的认知等复杂成分”。同时,心理学还认为情绪或情感都是“人对客观事物所持的态度体验”。情绪与情感的意思不尽相同,情绪更倾向于个体基本需求欲望上的态度体验,而情感则更倾向于社会需求欲望上的态度体验。

道德判断来自情感的直觉和理性的思维,来源于良知,也对良知产生影响,既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环境因素。

心理学家们认识到一系列快速、下意识的反应对直观推断等心理活动过程的重要性。弗吉尼亚大学的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特 (Jonathan Haidt)认为:如“谋杀自己孩子的行为是错的”这种判断,是一种类似厌恶行为的本能进化。其他如西方社会的“实行死刑不对”的情形,可能是社会化的文化使然,也许与特定的历史以及文化背景有关。

海德特的研究,假定了一个特定场景:其中只有兄妹二人,在一个小木屋中度假,决定体验性生活。彼此都采取了避孕措施,不可能怀孕生小孩,也就不会付出近亲繁殖的遗传代价。从那以后,兄妹俩再也不进行性接触,跟以前一样正常生活,既没有痛苦,也没有心理学上的不良反应。

耶鲁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保罗·伯龙 (Paul Bloom)说:不管是先天拥有的还是后天经过社会化获得的,我们的一些道德直觉并非是什么推理的产物。他还指出,道德直觉肯定不是道德的全部,推理即使不是道德决策的主要因素,也可能在道德决策中起重要作用。

在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给 12 个月大的婴儿播放一个动画片，片中，一个球正在一个山坡上往上爬，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正方形在帮助这个球爬坡，还有一个三角形在阻碍这个球爬坡。后来，球与正方形靠在一起，而三角形仍是单独的。根据婴儿的眼睛在动画片上停留的时间，得出结论：婴儿更喜欢球与正方形在一起的片子。这表明，即使是很小的婴儿也能注意到，那些帮助我们的人是朋友，而那些不帮助我们的人不是朋友。保罗·伯龙说：这就是人类道德的基本方面。

道德的判断是常常直觉而快速的，而道德的推理常常只是合理化先前的直觉判断。对道德直觉的深层次思考，可形成新的道德判断，并将作为社会道德构架的组成部分，成为人们未来的行为习惯。例如，当你得到一块发霉的食物或者腐烂的肉时，你不会想到：“它可能被细菌污染了，所以是危险的，我得离它远一点。”而是立即想到：“讨厌！”并赶快随手扔掉。

25 道德基因

道德既具有生物学起源，又具有文化起源。早年，进化生物学家率先揭示道德的起源、目的及生物学意义。现在，学者们已达成共识：道德在某种程度上是进化而来的。道德的成分也出现在一些人类之外的其他物种，特别是灵长类动物的种群内。很多动物都具有公平意识，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行为准则，这些准则加强了它们的社会相互作用，进而发展出该物种的相应策略，用于帮助个体之间的合作，也用于处理相互之间的冲突。

1990 年代发现所谓风险基因的里查德·埃伯施特恩 (Richard Eberstern) 教授率领耶路撒冷大学的科研小组进行了研究，发现了人体内一种可促进人们无私行为的基因。事实上，无私基因是所谓风险基因的一种反面变体。有趣的是，风险基因往往与吸毒、抽烟和其它危险行为有密切关系。据里查德-埃伯施特恩教授表示，那些大脑中多巴胺分泌量不够的人们往往为了自己感觉更好才会沾染毒品或其它不良恶习。或许，多巴胺在人类的各种社会行为中起着关键性作用。那些具有无私基因的人们做诸多善事的原因很可能也是他们能够在行善过程中体会一种良好的感觉。

埃伯施特恩教授称：“我认为，基因对人们从事善行的影响只会占到一半，而另外一半则可能受到人们所处环境和所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在研究过程中还发现，女性体内的无私基因较男性多。

26 道德意识

厌恶感觉很容易与道德意识问题交叉在一起。在历史上类似的情形有同性恋、异族间通婚等，但今天，在多数人眼里，这些已经不再是不道德的了。所以，在通常情况下，打动别人的情感，会比理性的据理力争所达到的效果更好。

作为美国总统布什顾问的美国著名生物技术专家李昂·卡斯 (Leon Kass) 有一个著名的论调：应该禁止人类克隆，因为它令人讨厌。保罗·伯龙 (Paul Bloom) 说：“知道这件事情令人讨厌本身是一个深奥复杂的情感问题，但这样却削弱了道德上的论断。”

如，一列火车失去了控制，呼啸而来，这轨道上有五个人。如不采取行动，这五个人必死。

<http://xian.name>

你可以选择按下开关，火车就能转到另一条轨道上去，但那个轨道上也站着一个人。你将会怎样做？也许，和大多数人一样，正确的做法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流血，你会采取理性的措施，按下开关。

但是，如果情况稍有不同，你又会怎么办？这时，你正站在过街天桥上俯瞰着铁道，火车疾驰而来，铁轨上仍有五人，但没有一条可让火车改道的铁轨，更没有开关。在你的面前站着一个小个头的家伙。如果将他推下去，横在铁轨上，他硕大的身躯足以拦住失控的火车。你这样做，可以牺牲他一人，换来其他五条人命。你将如何做？大多数人都不会将壮汉推到铁道上去送死，人们认为，主动杀死一个人，即使挽救了更多的生命，也是完全错误的。

普林斯顿大学的哲学家兼认知学家约瑟华·格林纳 (Joshua Greene) 和同事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了解人们在进行道德选择时的大脑变化。研究表明，不同的情形有不同的大脑反应。如果选择按下开关，大脑中与做“执行”决策有关的大脑前区则变得活跃而行使功能。当决定是否将人推下铁轨送死的时候，与快速情感反应有关的脑区出现大量的活动。格林纳解释道：大脑中与死亡相关的脑区已经进化得相当完善，按照这一脑区处理的指令，将一个人推去送死，显然是违背个人道德意愿的。

除了不同脑区的激活，做决定还需要时间，如果决定将壮汉推下，则需要的时间更长。有证据表明，在人们考虑采取道德上不正确的行动以获取更大利益的时候，大脑内部就产生冲突活动。这时，前扣带皮质脑区的活动增强，前扣带皮质在出现认知冲突的时候会被激活。紧接着，与认知控制以及情感反应抑制有关的大脑区域被激活。

当人们以意识、推理来指导道德时，就可能以个体利益而不是群体利益为出发点，作出缺德的行为。例如，有一个人，常常得到姐姐的资助。一天，他中了彩票，有一百万奖金。得到消息的他非常高兴，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姐姐说：“我拿到奖金就给你 10 万元。”心情平静后，他后悔了。觉得这奖金是自己的，应受自己支配。几天后，拿了资金的他就回避姐姐，不再提及奖金的事。

27 道德的消退与泛化

当初，可能仁爱之情只限于家族，但不久，这个向外扩张的圈子先容纳了一个阶级，然后容纳了一个民族，然后容纳整个人类，最后，它影响到了人与动物世界的关系。在古代，人们道德考虑的范围很狭窄。但随着人与人接触的增加，道德考虑的圈子扩大，昔日的异类逐渐纳入圈子，成为自己的同类。这样的道德进步就是道德的泛化。

与此相反，当社会出现混乱、倒退，道德考虑的圈子就可能会缩窄，昔日的同类逐渐离开这个圈子，这就是道德的消退。

28 判断道德

羊非常警惕狼，只要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立即准备逃走。如果羊等到比较确定是狼，才逃走时，那羊的生存机会就大为降低了，它宁愿多犯些“认为有狼来，而实质只是风吹草动而已”的错误。

人类常常出现错误判断，即“真判断为假”的错误肯定与“假判断为真”的错误否定。在一定的条件下，错误肯定与错误否定此消彼长，但是，一般地，错误肯定比错误否定大得多，人们宁愿放大“好人”判断为“坏人”的出错概率，而不想增加把“坏人”判断为“好人”的出错概率，以免增加受到伤害的风险。为此，人们不会轻易判断一个人“具有公德”，而宁愿判断他“没有公德”。

当人们以个体利益为出发点时，会尽力降低错误否定，但是，如果错误否定太小，由于错误肯定与错误否定此消彼长，错误肯定就会增大，“好人”判断为“坏人”的出错概率就会增大，人们就会相互猜忌。因此，当需要考虑群体利益时，就不能让错误肯定太大，人们需要相互信任，遵守共同良知。

具有良好道德声誉的个体会降低自身的社会和经济成本，进而会强化自身的道德观念。为此，人们常常关心道德声誉多于关心道德修养，这也是什么人们会遵守通过公共说理而产生的共同良知的原因。

例如，有一个人非常穷，住的是一层很旧的砖瓦房子，每逢下雨天就漏水。于是，他就向大姨借了几万元，加盖了房子。几年来一直都没有能力还这几万元。十年后，他的村庄快被政府征地，每个户口可分得几十万。有一天，他女儿病了，他再向大姨借钱。大姨说：“我现在只有千儿元，给你几百元吧！”他说：“不行啊，我要几千元。”大姨说：“我正准备盖房子，那这么多钱？”他就大声地说：“我等着救命的。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大姨说：“你向你弟弟借吧，我十年前借给你的钱还未还呢？”于是，他就与大姨闹翻了，还对其他一些亲戚说他大姨“见死不救”、“我没有这样的亲戚”。半年后，征地分钱了，他请了不少亲朋吃喝，就是没有还大姨的几万元。

29 讲道理能增进家庭和睦

讲到这里在，我们应该明白：只有相互提供机会坦诚沟通，就能够讲道理。讲道理产生群体内的共同良知，产生公共道德，提高群体竞争力。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

(1) 公共说理就是建立在参与各方平等的基础上，信息开放，说服中立的具有独立思考 and 判断能力的第三方听众。这是公共说理原理，即是讲道理第一原理。

(2) 共同良知是由公共说理而获得的社会公共常识，是社会信息自由的产物。这就是共同良知原理，即讲道理第二原理。

讲道理能增进家庭和睦和家庭幸福。在一个家庭中，如果没有相互沟通、讲道理的气氛，那这个家庭的几个子女就不可能一直团结。例如，在一个大家庭，开始时，子女们互助互爱，但是，父母非常偏爱儿子。由于担心女儿们有意见，就瞒着女儿们，偷偷地送钱送物到儿子家。有病痛了，老人家就找女儿们，让她们出钱出力。逢年过节，女儿们给的钱都不舍得花，宁愿送给儿子去赌。女儿们买水果来探望，也不舍得吃，转头就送到儿子家。当女儿中有人提及儿子赌博，父母就显得非常不高兴。在这个家庭中，信息不开放，也没有说理的平台。由于没有讲道理，这个儿子就越来越过份，儿子与姐妹们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差，整个家庭就失去了团结和彼此间的互助。

30 讲道理能提高企业竞争力

<http://xian.name>

讲道理能增加或保持群体的竞争力，提高群体成员的道德修养。对于家庭、组织、公司，都应该尽可能的信息开放，为群体成员提供平等的讲道理机会。只有这样，这个群体才会越来越文明，越来越有生机。如果有人刻意封闭信息，破坏讲道理平台，那他肯定是别有目的的。

搞多一些集体活动可以增加一些员工的合作精神，但这不是根本的，良好的企业文化和企业道德才是根本。一间具有竞争力的公司，常常具有良好的企业文化和企业道德，员工们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企业道德主要源于企业内部的“讲道理”的风气，即一种公共说理的风气，一种相互沟通、共同讨论的风气。只有这样，员工才有参与感、归属感，共同为公司而奋斗。上司与下属的相对平等的沟通并不会伤害一个拥有内在权威的上司的权威，反而更能彰显其工作能力。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就有一个定期召开“管理评审”会议的要求，目的是使得评审员有一个与公司管理层相对平等的位置，提出意见并能与管理层进行有效的讨论。

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的国际标准之一，在 1994 年提出的概念，是由 ISO/TC176（国际标准化组织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技术委员会）制定的国际标准族。该标准族可帮助组织实施并有效运行质量管理体系，是质量管理体系通用的要求和指南。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明确各职能和层次人员的职责权限以及相互关系，并从教育、培训、技能和经验等方面明确各类人员的能力要求，以确保他们是胜任的。ISO9000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做好自己责任范围内的事，而不是鼓励做别人责任的事，即“做自己所做”。

在缺乏说理平台的企业中，员工们会缺乏责任心，老板请工人常常是先看品行，才看工作能力；而在言路开阔的公司里，责任明确，人们的能力与操守受制于舆论和问责，老板看人就主要看工作能力。一间企业要提高竞争能力，就应该加强信息交流、责任溯源。以制定政策来奖励“好人好事”为主的管理方式是低效率的，一个具有良好的企业文化、企业道德的公司所制定的行为规范应该是用来惩治那些做了“不作为、不尽责”的人，而不应该随便地用来奖励一些做了“好事”的人。对于一些工作，如保险业务等，我们可以量化，并按劳取酬，但我们不应轻易判断一个人“做了好事”、“帮助了别人”。

例如，到年关，很多公司、单位都是会评先进，并予以一定量的奖金。在一些部门，谁优秀，谁先进是通过部门员工投票的，在信息流通封闭的情况下，常常是一些工作比较懒散而重于搞同事关系的人获得了优秀、先进。这种不公平会降低公司的凝聚力。

作品 2015 年 3 月完稿。

作者简介：醉放先生(<http://xian.name>)，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人。因时有醉而放言，故号醉放先生。